

浅谈国外发展研究

陈 一 筠

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期，“发展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去探讨那些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全球性与地区性的“发展”问题，去说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去探索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种探讨最初限于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后来迅速扩展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地理学、生态学等科学领域。于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新发展哲学”、“未来学”等新的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各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预测”竞相问世，与此有关的大量名词术语令人眼花缭乱。学者们的热情激发了政治家们的兴趣，积极的科学探索受到各国政府与民众的重视与支持，因而一些著名的官方研究机构和民间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如美国的赫德森研究所和罗马俱乐部，英国的东安哥拉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中心，法国的未来世界研究联合会，西德的慕尼黑发展研究中心，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等等。第三世界对发展研究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拉丁美洲经委会率先行动，墨西哥的第三世界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非洲的达喀尔非洲规划研究中心等紧步后尘。苏联、东欧国家在这方面当然不甘落后，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都设立了发展与预测研究部门。联合国所属的一些国际组织（如科教文组织、世界银行），设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以及其他国际学术机构，都经常召开有关发展问题的研讨会、报告会。最近的几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也把社会发展与变革作为中心议题之一。至于这方面的著述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国外发展研究的部分情况作一概略的介绍，重点将放在有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争论上。社会主义各国的研究暂不涉及。

一、欧美现代化史与“经典”现代化理论

“发展”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发展理论”也从无确定的内容。“发展”、“进步”、“增长”、“变迁”常常被当成含义相近的术语使用。一般说来，经济学家笔下的“发展”指的是“经济增长”，社会学家则用“社会变迁”来说明“社会发展”，其他各门学科也有自己的“发展”范畴。

在西方近半年来的发展研究中，人们普遍采用“现代化”概念来具体表述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这一概念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等含义融合在一起，把工业化、人口增长、科学技术进步、文明类型的演进乃至社会形态的更迭等等囊括无遗。因此，现在所谓的发展理论，多半是现代化理论的同义语。

关于人类史上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争论。有人认为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已有现代化的最初征候；但多数人的意见是：现代化

的起点是十七世纪英国的市民运动和工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乃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高潮，十九世纪德国以及后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奋起直追，基本上完成了现今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实现了一系列巨大变革。而当时包括俄国、日本在内的东方各国，还有南半球诸国，却处于远远落后的状态，有些国家甚至还停留在奴隶社会和原始时代。帕森斯在《现代社会系统》一书中，又从整个世界史的角度，把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为标志，第二阶段以西德的工业化为主导，第三阶段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迹。他认为，在欧洲现代化的第一、二阶段，美国尚处于后进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达到英、法等国望尘莫及的现代化水平。

如果把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化与民主化进程，那么可以说早就有了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启蒙主义的社会学说出现的本身，可被视为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形态。洛克的古典市民社会论，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孔多塞的人的精神进步史观，圣西门关于工业化社会的哲学概念，都与当时欧洲西北角，即英、法国的早期现代化有关。至于社会学对现代化的研究，则可追溯到孔德、斯宾塞有关工业社会的实证主义理论和社会有机体学说。后来，迪尔凯姆的《社会劳动分工》，滕尼斯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礼社会》，韦伯对合理化与科层制的分析，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派理论，以及穆尔和列维等人的著作，都是西方社会学探讨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典范”。尽管上述学者所处的时代和阐明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根据他们的描绘，大致可得出这样的概念：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两种社会有显然不同的特征：1. 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只具有个别性而不具普遍性，即血缘关系、家庭关系起决定作用，保障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和地位的资本是出身门第而不是才能和业绩（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2. 在传统社会中，主观的情感因素胜于客观现实，角色分工很不明确，王室成员干预国家政治与经济；3. 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人均寿命不长；4. 劳动分工不发达，社会流动性低；5. 对农业的依赖，商品经济不发达，行政管理无效；6. 教育落后，它不以培育富有创造精神和追求业绩的人才为取向。而现代社会在这几方面却有着相反的特征。根据穆尔、列维等人的论述，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1. 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教育组织高度专门化；2. 各种组织相互依存和制约，功能互补，社会的整合程度高；3. 社会伦理具有普遍性，不以亲属、家族世系等社会关系为转移；4. 国家权力集中，但不专制；5. 社会关系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功能局限和感情中立取代了传统主义、个别主义、功能无限制和感情至上；6. 有发达的交换手段和市场网络；7. 有高度发达的、金字塔形的科层组织，实行合理的指挥与控制；8. 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也低，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缓慢，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9. 家庭趋向核心化，家庭功能减少，女性地位提高；10. 社会规范的制约作用降低，社会粘合力减弱，人际关系趋向淡漠和疏远。

不难看出，以上的“传统”与“现代”之分，基本上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框架中构拟出来的，它部分地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实际，其中有些是表面现象的罗列，甚至有不切合实际的推想。

在六十年代开始的发展研究中，传统的发展学派遵奉“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试图将它普遍化，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向所有非西方国家展示了同样美妙的前景，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元化、民主化社会说成是一切“传统”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终极目标。

传统派的观点遭到了其他学派的反对，尤其在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上，各种学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围绕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争论

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成历史，学术界对那段历史经验已有总结。但为什么到了六十年代，现代化问题重新成为东西方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呢？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个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去寻找答案：昔日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它们急需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对殖民地仍旧恋恋不舍的“宗主国”，这时又不得不寻求在经济上、政治上与独立后的国家建立新关系；过去并非殖民大国的美国，战后跃居独占鳌头的地位，它的发迹经验不仅对不发达国家有吸引力，甚至也使欧洲老牌先进国家的某些学者赞叹不已；苏联的经济复苏和日本的振兴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和“东方模式”的兴趣；以跨国公司的兴起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新的全球性扩张，使众多国家的实业界人士困惑和忧虑；资本主义世界反复出现的危机与衰退、西方列强之间新的角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使大批不发达国家转而去探索“第三条道路”，它们既不想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又不想陷入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困境；联合国建立后致力于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后来积极支持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发展。这一切因素，都激发着人们去探究“发展”、“现代化”以及“不发达”和“依附”的真正含义。

六十年代开始的发展研究，着力讨论后进社会现代化面临的许多课题。发展社会学也以发展中社会（developing Societies）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方面的学派众多，有人大致把它们分为自由派和激进派；也有人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分为自由主义、历史主义、管理学派、“发展第一”学派或人文生态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学派基本上受十九世纪进化论和二十世纪结构功能主义影响，奉“经典”现代化理论为楷模。这一派的理论以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为代表，强调发展的共同性与整体性。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1.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趋同：几个世纪里，世界上的发展变迁呈阶段性、普遍性，一切国家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正在紧步先进国家的后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是以前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为特征的，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的具体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它统统都在排队等候资本主义的“特别快车”。

2. 现代化社会的各种特征不是孤立的，它们构成一幅社会的整体图象；先进工业社会的整体图象越来越相似，从经济基础到价值体系、政府组织、阶级结构、家庭和宗教状况等方面，都正在“消除差别”。

3. 发展的障碍来自社会内部；本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它抗拒社会经济的任何改革，毁灭人们的进取心，破坏企业家活动的条件，阻碍支持这种活动的社会机制正常发挥职能。

历史主义学派却强调特殊性与历史性。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有着各种独特的情况，反对把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即现代化过程）说成是欧洲既往历史的重复。由于发展的起始条件、时机、国际环境等因素各不相同，后进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当年的“模式”。例如，它们无须自己去创造发明而可以直接引进先进国家最尖端的技术，从而使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十九世纪德国的工业化和战后日本的“腾飞”，都是超速发展的例证。这一学派认为，

传统文明与现代化是可以相容的，不应当机械仿效别国而疏远本民族的文化，那样所引起的矛盾更为复杂尖锐，应当允许多种文化并存。这一派常常以日本、新加坡、南朝鲜和某些伊斯兰国家为例，说明在较为保守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仍可取得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拉美学者提出的“人类发展新道路”（即巴里洛克模式）更加明确地指出：不发达国家不能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这不仅因为当代的条件不同了，而且还因为前者的道路并不可取。机械地仿效西方发达国家，就意味着重蹈不合理消费、资源与产品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变的覆辙。

管理学派实际上是经济技术决定论学派，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唯一出路：经济发展了，社会自然就富裕，就有了平均分配财富的前提，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民主化；而经济落后，民众贫困，这往往是政府专制、社会不平等和政权频繁更迭的根源；国家越穷，贫富差别越大。这一派对“全球问题”和“全球模式”的探索也是引人注目的，他们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将促使社会“非意识形态化”，技术决定着社会的命运，科学技术缔造着人类的进步与和平。这些观点曾使众多人叹服。

然而，反对上述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派，即“**发展第一**”学派，有人也称之为人文生态学派或“反增长”学派。缪塞尔·亨廷顿就曾指出，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政治上的稳定与进步。统计数据表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在政治上要比稍富裕的国家稳定，因为在经济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也积极起来，要求实现政治参与；社会流动日趋频繁，致使人们在经济与政治上产生先前不曾有过的企望。如果政府和各种政治机构无力满足民众越来越多的要求，民众的不满就会导致动乱，政府反过来又不得不强化专制统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大有特色，但政治进步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此外，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也不是一回事。增加的财富并不一定转移到普通消费者手中。在亚、非、拉的某些国家，从经济技术发展中获益的主要是高收入者集团，而贫苦大众的处境却每况愈下，社会不平等反而加剧了。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政治上落后和社会不平等的国家，工业化速度越快，农业生产率越高，经济指标上升越显著，收入分配就越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

于是，从七十年代起，研究发展问题的许多学者都把注意力转向了**人和社会的发展**，探究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日本社会学家驹井洋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现实情况表明，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施惠于社会所有的成员，不能使他们在生活方式、生活机遇和生活动力方面有所改善。因此，评价发展应有适当的价值前提。在他看来，平等、根除贫困、确保真正的人类自由、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民众参与决策，便是社会发展的五个价值关键。他认为，那种靠牺牲民众教育、劳动保护、社会服务、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社会进步因素而求得经济指标上升的“增长第一”战略，其后果是令人失望的。他把经济增长与社会条件无所改善的情况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并且呼吁：从“增长第一”转向“发展第一”已是世界各国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其他国家的进步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如法国学者佩鲁在《新发展哲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起决定性作用，它决定加速减缓增长的必要性，并检验增长目标的合理性。佩鲁认为，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中，这种有害后果表现为“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发展不平衡。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一旦插足，它们就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把富人和权贵拉进自己的势力圈，为他们提供赚钱的机会和西方生活方式，使他们脱离本国人民。”这是不平等加剧的突出表现。因此，他认为，必须从经济、技术、

社会、政治和社会学的角度全面评价发展的内容和实质。

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其观点多半较为激进。他们与所谓“依附”论者合流，在关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辩论中独树一帜，对青年社会学家影响颇大。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工业化国家的发达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互为因果的方面；殖民帝国主义时期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劳动分工不公正的结果，前者的发达必然以后者的贫困为代价。穷国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充当农产品和矿物资源输出国的角色，富国则向其输出资本、工业品和初级技术，富国的输出有时打着“援助”的幌子，但这种“输血”机制大大抑制甚至破坏了穷国的“造血”机能，使它们长期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政治独立，但这种独立对其发展的意义并不显著：它们在经济上无法摆脱依附状态，仍旧不得不循着先前殖民统治者给他们铺设的轨道蹒跚而行。不过依附形式有了变化：渗透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其补给线伸延到世界上最“边陲”的地区。把世界分为“中心”、“半边陲”和“边陲”地带，是发展研究中部分学者的观点（最初由匈牙利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有人把跨国公司的扩张称为“后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认为它正在使世界走向“一体化”。后帝国主义不再通过武力征服穷国，而是通过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种手段加强渗透，各个跨国公司之间为争夺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而进行着食人生番式的斗争，它们重新绘制了世界地图，穷国实际上又被纳入了富国的“势力范围”。穷国的依附发展付出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代价日益高昂：1. 穷国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每年有大笔收入外流，外汇储备少，外债日积月累，偿还困难。2. 国内阶级结构两极分化，出现了一个“新买办阶级”，他们情愿为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服务，而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他们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感情都渐渐脱离本国文化和本国人民。3. 由于生产的“外向型”发展，着眼于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因而国内市场与消费受到抑制，传统的民族工业受到排斥，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增加，使本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4. 不发达国家的某些城市呈畸形“发达”状态，它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是为新殖民者投资和进口的需要而“开放”与发展起来的，它们多半是些交通方便的港口，并不是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这些“殖民地”式的城市在经济发展上与周围地区很不协调；并且跨国公司的老板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第二家园”，竭力排斥当地文化，以满足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因而这些城市在文化上与其他地区相对疏远。5. 外国资本的渗透、商品的输入以及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传播，必然产生“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示范效应，使人们的需要、企望与现实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有时危及国内政治的稳定。6. 教育发展的“畸形”，即本来就很少的教育投资多半用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而中等和初等教育被忽视，全体国民的文化水平难以提高；由于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不发达，吸收高级人才的职位就十分有限，因而持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们的就业竞争激烈，致使人才大量外流。7. 穷国的决策人物往往由于与国际资本合作取得了酬劳，无意扭转本国的依附局面，有时为维持这种局面不惜对本国反对派诉诸武力。

当然，有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殖民主义的作用，认为它们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外在动力；只要这些国家善于采取适当的战略，取外国资本之利而弃其弊害，就能取得较快的发展。很多人以拉丁美洲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拉丁美洲国家与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时间最长，那里早就形成了带有激进思想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拉丁美洲国家在十九世纪

就获得了独立。但人们认识到,获得国家主权并不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最终目标,仅仅是“国家发展”的条件之一,还必须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条件致力于经济上的自主发展,改变本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所以,拉美经委会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考察国际劳动分工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后来提出了所谓“内向型”发展战略,即发展进口-替代型的制造业(如进口半成品和引进技术,由本国组装出口),其目的在于抵消“外向型”经济的消极后果,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使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和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保持适当比例,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一战略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减少国家投资。结果,拉美近二、三十年来工业增长率确实很高。然而,许多清醒的研究者都指出:拉美经济的发展并未减少跨国公司的渗透;鼓励私人资本和各种产业部门的非国有化趋势,恰恰给跨国公司以可乘之机。在拉美国家越来越多地出现的子公司,逐渐左右了拉美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形成了拉美国家对国际资本的新的依赖关系;技术上的依赖助长了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财经上的依赖表现为持续的通货膨胀;为向“内向型”转变而发展的进口-替代工业使外债猛增。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有利于自己的技术去加固新的依赖关系,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这类组织进行“援助”,把受援国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战略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拉美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在“新殖民主义者”和“本国傀儡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由于发展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工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按资本投入与产出计算的工业增长速度,所以就业机会并未扩大。更为不幸的是:由于跨国公司从上到下高度统一和组织严密,又善于神机妙算,常常得以逃避各种法律,把设在第三世界各国的子公司所获利润隐瞒起来,偷偷弄回本国,致使依附国家受损。所有这一切,都使拉丁美洲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感到忧虑困惑和失望。对“拉美模式”幻想的破灭,又导致了关于“独立”与“依赖”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索性认为,在当今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正在结成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独立”意味着闭关锁国,其结果就只能是“不发达”,关键问题是解决内部的不适应与不协调的问题,并采取有力的社会经济措施抗衡国际资本进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加强本国的竞争能力,以取得平等的“伙伴”关系。

总之,目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不发达”的根源,但不否认“依附”国靠富国“剩余”力量的推动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他们认为,由于是一种依赖性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国际资本自身利益的制约;靠跨国公司的渗透或者在国际资本羽翼下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一种“畸形”发展,它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强盛;国家难以控制资本积累过程,扩大生产性就业受到限制,人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长没有保障,社会的平等就更谈不上。

三、关于日本发展模式的探讨

在关于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中,许多学者把兴趣转向了日本,对这个东方国家从明治维新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和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刮目相看。亚洲发展中国家有意奉日本为楷模,日本自己的许多学者,也在不断对本国经验进行总结和传播。

“经典”的发展理论几乎完全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概括。虽然韦伯吸收了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东西方社会、文化作了比较,并试图将其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命题用于具有不同起始条件的东方社会,但他的尝试未获成功,因而最终得出结论说:现代化的诸条件“只存

在于西方”。他认为，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自发产生了现代科学技术，造就了专门人才，培植了资本主义和完善了科层组织，日本也是通过文化传播而成功地接受了现代化思想的。在韦伯那个时代，日本尚处于工业化初期。

英国学者多尔致力于研究“迟发展”理论，他把日本也称为“迟发展”国家，并将英国、日本和第三世界某些迟发展国家作了比较，指出“早发展”与“迟发展”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条件：1. 经济发展机会很不相同，迟发展国家不能掠夺和剥削殖民地，不得不在早发展国家的支配下发展经济，并且相当一个时期靠出口初级产品。2. 迟发展国家无须重复实验过程去发明新技术，但依赖进口技术也有不利之处：人力的节省不利于就业，消耗资金造成巨额外债。3. 迟发展国家“被现代化”，因而政治上也有一定依附性。4. 迟发展国家迅速接受先进的科学、医疗和通讯技术，使人口激增，信息泛滥，民众企望提高，政府无所适从，这种情况反而会阻碍发展。5. 早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某些主张、愿望、追求，如保护环境、保障人权、增加福利等等，对迟发展国家影响很大。6. 迟发展国家把某些社会技术也“移植”过来，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把文凭作为分配职业的依据，产生“文凭热”，学校注重考试而忽视教育的真正意义；正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超过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致使许多有文凭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7. 迟发展国家多半采用传统的“组织型”雇佣制，早发展国家采用的是“市场型”雇佣制。多尔的“迟发展效应”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发展的表面特征。

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对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和发展途径作了更深入的分析，进而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某些“奥秘”。

富永健一首先指出，社会学倾向于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现代化进程。他认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所以很容易接受英国工业文明成果，是因为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平等的结构层次上，不存在依附关系，有自主发展的条件；并且，它们属“同质文化”的范畴，基本上不存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立。而对非西方的迟发展国家来说，西方的工业文明却是“异质文化”；并且，大多数非西方迟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起始点上就面临着与西方当初起步时不同的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开始时已是经过一定程度发展的“低发达”国家，而非西方的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却是从“不发达”状态起步的，这种“不发达”状态，与它们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从属地位不无关系。这段从属与依附的历史，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曾有过的。这就是说，非西方迟发展国家现代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它们的传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冲突。

日本的情形如何呢？诚然，日本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世界”，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先进国家，有自主发展的条件。但是富永健一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在其社会内部。

对日本来说，现代化工业也意味着从外部输入与日本传统社会和文化相异的东西。这种输入并不象“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并且要获得多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根据富永健一的观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有如下重要环节：

1. 把握时机，大造革新舆论。

日本也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国家，它内部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自发产生现代化的原动力——科技革命、市民革命、产业革命等等。从外部输入这些“新事物”的过程，无疑是对日本传统社会带有破坏性的过程。这需要把握时机，还需要有革新的勇气。日本的革

新派从德川幕府时代就初露头角。那时，日本国内的财政困难与国防危机交织在一起，于是出现了一批贤人哲士，如会泽正志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他们揭露了日本社会的虚弱情况，为革新大造舆论。幕府末期的政治口号“尊王攘夷”，大大启发了日本人的国民觉悟，为改革提供了“国民统一”的价值前提。“尊王攘夷”体现了以国粹主义为基础的重视国防的意向，由此而导致了倒幕思潮和反封建运动，为明治维新准备了条件。

2. 通过一批社会精英输入西方的工业文明，并使它在日本落户。

到了明治时期，涌现出了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一大批致力于改革的志士仁人，形成了一个同以西乡盛隆为代表的传统派对立的“现代派”。他们到欧美先进国家考察近两年，在国内外国情况的对比中认真思索了日本的前途问题。他们为了确保发展本国经济的条件，大胆粉碎了传统派的征韩企图，排除了一系列内部冲突与混乱，组织了新内阁，实行发展生产、振兴实业的政策。明治政府在危机中贯彻了谨慎防止内部分裂、坚决扶植工业化的方针。这与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随之出现了军阀割据，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无法推行工业化、现代化路线。

3. 工业文明的本土化、内在化。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育起了很大作用。西方工业文明输入日本后，教育体系也迅速作了适应性调整，很快就培养出一批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熟悉企业管理的知识分子，涌现了一批有一定资本、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实业家。他们把西方的工业化经验用于日本，并调查研究日本自身在原料供应和市场销售方面的特殊性，创造性地发展了各种类型的企业，迅速打开了经济振兴的局面。经济发展了，国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工业化方针便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如果只有政府对工业化的倡导和援助，而不能从国民中涌现出大批的实业家去承担工业化的任务，就只能实行官办企业，可是官办企业往往亏损严重。而日本能够在短期内成功地推进工业化方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充分发挥了国民的潜力。当时涌现出来的一批实业家中，有昔日的武士，也有农民和普通市民，各阶层民众都被工业化的浪潮激发起来，争相作出自己的贡献。

4. 现代派与传统派矛盾的消除。

异质文化的输入，必然会遇到国粹主义的抵制。日本现代派与传统派的对立，从幕府末期延续到昭和前期（一九四五年以前）。有的现代派领袖甚至遭到暗杀，如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大久保利通都在暴徒手中丧命，其间发生过多起动乱和战争。现代派大多在城市、大企业和知识分子圈内，而农村、自营小工商业和非知识分子阶层，则是传统派，亦即国粹派的势力范围。这种对立和斗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化。来自贫困农村的日本陆军兵士，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先锋，在两派矛盾的推动下，终于导致了全面战争。从幕府末期就开始的现代派与传统派对立这种二重结构，历时近百年，直到日本战败后才得以彻底铲除，这似乎是历史的偶然为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腾飞”排除了最大的一道障碍。

当然，对日本模式的真正含义和优劣，国际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某些日本社会学家的批评尤为激烈。福武直甚至告诫发展中国家，切莫效法日本这个“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而追求经济腾飞”的过时“样板”。

值得重视的是，在探讨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条件和“模式”时，国外学者几乎都提到这样几点：1.现代化本是产生于西方的文明过程，要通过文化传播而将某些西方事物“移植”到东方各国，那么，接受和适应有悖于本国传统的“异质文化”便是这些国家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2.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单一过程，它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人本身的现代化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所有这些方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物质手段，人和社会的发展应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况且，经济增长本身又是受各种非经济因素制约的，若不认识这一点，连经济增长也难以实现，或者只能实现“虚假的增长”。3.西方国家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现代化，也曾遇到守旧派的各种抵制；而非西方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现代化决策时，遇到的内部反抗必然更为强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也许可作为最近的例子；现代派与传统派的斗争，大都表现为权力斗争，只要这种斗争不平息，现代化战略就无法顺利进行。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

1. H·阿拉维、T·香宁：《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概论》，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2年版；
2. 《第三届亚洲社会学家会议论文选》，东京，1982年英文版；
3. A·韦布斯特：《发展社会学导论》，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年版；
4. E·赫玛西：《第三世界社会研究概述》，载美国《社会学年评》，1978年卷；
5. 富永健一：《近代化理论之今日课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严立贤译。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